



# 寻找历史间隙里的黄翠梧

陈杰

近日,郑女士的专著《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团结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郑著”)受到关注,作者努力打捞史料,在历史间隙里发现以往被忽视的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群体,称她们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标本,这些女性独特的历史意义长期被“家属”的标识遮蔽。这本书打开了一片斑斓的女性世界,是当下西南联大叙事的一项突破。

由于史实的湮没,该著存在若干错漏之处,试举二三。

汤佩松(1903—2001)教授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西南联大时期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夫人是加拿大籍华裔黄翠梧。郑著第142页有这样的脚注:联大时期汤佩松和金岳霖算是少有的单身汉,金岳霖四处蹭饭,汤佩松则常办派对。汤佩松到1950年才结婚,反清斗士的儿子娶了保皇忠臣的孙女,汤夫人郑女士是宣统皇帝老师郑孝胥的孙女。

事实上,汤佩松1930年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黄翠梧成家,两人都从事“探索生命现象之谜”的植物生理学研究,共同在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学研究所完成实验工作。1933年8月,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的汤佩松已在哈佛大学开展三年研究,夫妇俩育有一子又龙,他决然回国。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抗联震动了在美华人,加上美国经济危机带来恐慌与混乱,作为受庚子赔款资助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汤佩松认定终生报“国恩”。同学兼挚友罗伯特·马歇尔(Robert Marshall)答应在纽约大学建立一项基金专供汤佩松继续长期研究,并护送患眼疾的黄翠梧回加拿大娘家,汤佩松对此十分感激,但还是拒绝了这一挽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黄翠梧带着6岁的又龙从美国回到中国,前往汤佩松任教的武汉大学,她支持丈夫到前线参军,出力杀敌。然而,汤佩松未能如愿从军,回校继续研究为毒面具用的活性炭。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汤佩松把妻儿送到香港暂居。

1938年9月,汤佩松应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三常委之一梅贻琦的邀约,任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年底,汤佩松把在香港的妻儿接回昆明。1939年冬,夫妇俩有了儿子肖龙(肖龙之后,又有一个孩子湘捷出世)。一家五口居住在昆明郊外大普吉村研究室旁的简陋小屋。生物学系研究生、助教吴征镒每到研究室,常看到黄翠梧在家门口用木盆、搓板给先生洗衣服,看上去非常勤俭,想来她也是早期从福送到加拿大的华工后裔,出生于苦寒人家。她还帮汤佩松写论文。(见吴征镒:《我所认识的大普吉人》,刊于清华校友总会官网,2009年6月18日)1943年3月1日,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来到植物生理学研究室,看到实验室与寝



上世纪30年代末,昆明大普吉,西南联大农业研究所员工和家属合影。

室混在一起,房屋用泥砖建成,汤佩松的卧室、客厅,除了床、桌子、椅子,没有更多的家具或物件,卧室没有天花板,能看见瓦片,李约瑟当日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这些学者居住的房屋像法国或威尔士人的农舍,有些原始且没有装饰。”(见李约瑟、李大维著《李约瑟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当晚,吃过一顿中餐后,汤佩松和夫人黄翠梧召集年轻研究人员和家属围着火塘办了一场大型家庭晚会,欢迎李约瑟的到来。

大普吉的生活愈来愈艰难,汤佩松变卖衣物度日,黄翠梧将仅存的一点东西全部折卖,由于营养不良,缺医少药,本就患有眼疾的她双目渐渐失明。1943年春,又有身孕的黄翠梧不得不只身带着三个孩子由昆明乘极为危险又是唯一的驼峰航线绕道印度,换船经澳洲返回美国,后定居故乡加拿大。汤佩松后在其著述《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位生理学家学家的回忆录》中说,“她(黄翠梧)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使我终身感激、难忘。她为我们的四个孩子在旅途中以及后来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期不能往来而承受的痛苦和牺牲,只有她这样一位顽强的妇女方能做到。我和我的孩子之所以有今天的一点点成就,是和她的毅力分不开的。”

1947年6月,汤佩松接到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李约瑟的邀请,7月中旬赴伦敦参加第七届国际生理学会会议,会后途经美国转赴加拿大看望黄翠梧和家人,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夫妇俩最小的男孩志龙已4岁,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家人团聚颇多伤感。这之前,黄翠梧通过侨胞亲友已在温哥华大学及其他地方与人商谈了丈夫留在加拿大的可能性,但是汤佩松自认不能与母校清华大学“不辞而别”,坚决于同年10月回到北平,从此在困苦环境中挣扎的黄翠梧天各一方。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动员北方教

苞苴,借诗文通声气。如此,风雅之诗社变成了“巴结请托”之地,实在是“对风雅”的一种讽刺。

梁叔子是城北诗社里的“老名士”,代表当时那些由前清过渡到民国的高龄名士。他们以传统名士自居,一般都有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操守,在改朝换代之际也选择过遁隐生活。但刘云若却注意到民国初期有很多名士只是刻意营造这种名士形象而已,其行却呈现出虽隐实仕、表里不一的特点,于是便塑造了梁叔子的形象。梁叔子表面厌弃利禄,盼着“优游林下,纳享清福”,做一个风流名士,但其又有“到北京去有所谋干”这样的行

民国时期的天津因存在租界而成为文人墨客、遗老耆宿的集居地,城市雅文化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以诗词为代表的雅文化更一度繁荣,饭馆、公园、运河之畔,以及文化遗址等地,便经常有诗社词社雅集的情形。而对于文人结社所呈现出来的“风雅”,当时的知识青年却有自己的反思与判断,诸如青年作家刘云若在其《冰弦弹月记》中便写出自己对“风雅”的反思。

《冰弦弹月记》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初,小说主角为某报社青年编辑陆九芝。此人一表人才,又颇负才华,深得名士耆宿赏识,是当时城北诗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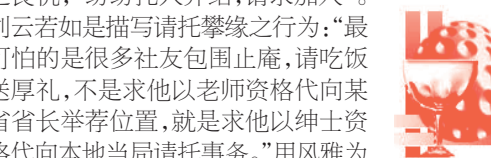
津派文化的文学表达(五)

## 刘云若的“风雅”反思

孙爱霞

成员。小说的主线是陆九芝与鼓姬月琴、厨娘二姑娘之间的情事纠缠,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诗社耆宿梁叔子、徐止庵。在第一章,天津城北诗社成员老名士梁叔子拟学易顺鼎天桥咏姬,欲作咏天津“三不管”地界之《三不管歌》,于是便有天津“三不管”一日行。梁叔子“三不管”之行遇到色艺双绝之鼓姬月琴,惊为天入,归后作诗数首。待诗社雅集之日,梁叔子便把月琴之色艺双绝加以渲染,令徐止庵等人皆欲把月琴介绍给同社陆九芝。于是在梁叔子、徐止庵等人名士心理的助推之下,陆九芝先后与月琴、二姑娘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冲突,并最终皆得圆满。与刘云若以往小说相比,《冰弦弹月记》对传统诗社着墨甚多,对诗社所展示出来的“风雅”则含有一种批判的态度。

《冰弦弹月记》中徐止庵是城北诗社的主脑,现实社会中则代表着有钱有闲、又有社会声望之前清遗老。此类遗老是有体面的创作者,是当时“旧文化”的活载体,曾成立诸多雅集社团,诸如上海浛社、青岛“十老会”、天津城南诗社等等。刘云若自是关注到这种文化现象,便在小说中塑造了徐止庵这一人物形象:“社中主脑和灵魂是一位前朝遗老徐止庵先生。此公爱慕风雅,纠集同志,创立诗社,借此遣兴陶情,本意为高雅。”成立诗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于退出历史舞台的遗老而言,不失为消遣时光、慰藉心灵之雅举。但刘云若又注意到此“风雅”之举背后竟也有庸俗耐耐之事,即有些人欲借“风雅”而行攀缘请托之事。诗社主脑徐止庵虽已退出政治舞台,但其“门生帮吏遍于天下,还颇有势力”,于是很多人欲巴结请托而“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及至诗社成立,便看到结交攀缘之良机,“纷纷托人介绍,请求加入”。刘云若如是描写请托攀缘之行为:“最可怕的是很多社友包围止庵,请吃饭送厚礼,不是求他以求资格格地向某省省长举荐,就是求他以绅士资格格地向本地当局请托事务。”用风雅为



沽上丛话

授南下,黄翠梧又来电报说已为丈夫在温哥华做了职业安排,汤佩松慎重地与老友陈岱孙长谈几次,下定决心不再离开北平。不久,黄翠梧与世长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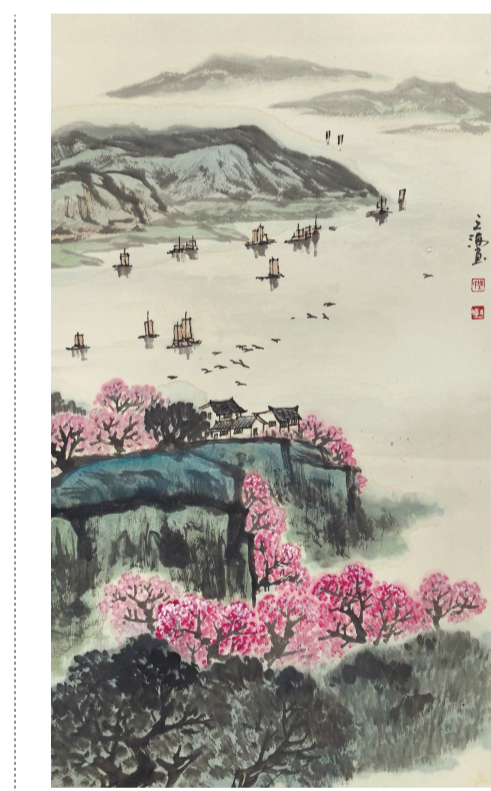
1950年,汤佩松与郑襄结婚。这一事实可参见邵瑜所写文章《母亲郑逸事》(刊于清华校友总会官网,2018年12月13日),文中提及“十姨郑襄是植物学家汤佩松夫人”“他们是1950年结婚的”。1979年春,76岁的汤佩松去加拿大探亲,和长子又龙一起为黄翠梧扫墓,表达他的哀悼、感激和忏悔之情,之后告别了儿子,回到祖国。

西南联大一众学者、教授,即使生活十分困难,依然没有放弃科研探索。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金属研究所教授余瑞璜,召集位于大普吉村的农业、无线电、金属三个研究所的科学家,每月定期在大普吉村与梨园村之间的一家茶馆会晤,参与者轮流作工作报告或大家进行专题讨论,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经常出席的有吴有训、任之恭、汤佩松等15人左右,别称“梨园会晤”。这些科学家有的于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全部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汤佩松在前述回忆录中说,“最使我们高兴的还是我们这个集体里的物理学系的学生中出了两位比我们成就更高的人物:杨振宁和李政道!”而非郑著第142页脚注所写“常到的15人日后均为科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物理学系的李政道和杨振宁也在其中”。

另,郑著掀开了历史一角值得真实回望。1946年7月15日下午,民主斗士闻一多在自家门口昆明西仓坡遇刺,陪伴他的长子闻立鹤立刻扑到父亲身上,紧紧护卫父亲,身中五弹,右腿被打残,肺部被打穿,血流如注。值西南联大已结业,闻立鹤正待北上清华大学外语系复学,当时他并非如郑著所说是“中共党员”,而是于1948年1月在北平入党,后化名“高克”。(见高晓红:《蜡炬成灰泪始干——回忆我的父亲闻立鹤》,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官网,2006年4月24日)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次日,闻立鹤奉派参加接管铁路工作组,之后长期在北京铁路局天津分局工作,1975年调至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回归专业,1981年3月病逝。

再者,郑著“前言”说,在照片中看到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迁往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4月抵昆时各方欢迎的实景,赵元任教授的二女儿赵新那那是献花的少女之一,二女婿黄培云作为旅行团副队长,站在受欢迎人群的前列,那应该是他们的初次相遇,说不定还是初次相识。据《黄培云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已述,在人群中,“第一次碰到了我后来的老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并不认识,直到我留学美国,才在清华同学会聚会时真正认识她。”黄培云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后通过庚子赔款留美考试,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读博,1941年,他在赵元任家(已于1938年8月赴美)参加同学会,帮赵新那洗碗时两人相识。所以,郑著写献花的组织者之一赵元任夫人杨少伟“在冥冥中已将女儿的命运排定”,只是美丽的臆想。黄培云和赵新那1945年7月在美成婚,1946年底相偕回国,黄后来成为我国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这一个个烽火与战乱中西南联大的人物故事,令人感慨、回味;后学当真实客观地呈现,方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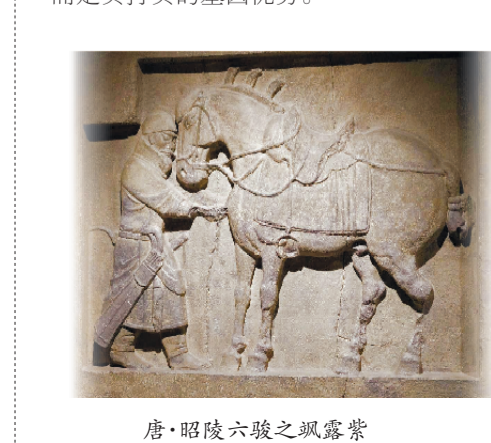
春和景明(中国画) 陈之海

## 马背上的中国史(五)

# 以肥为美话唐马

赵威

如果说汉代马是“铁骨硬汉”,那唐代马就是“雍容华贵的潮男”。逛博物馆时若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唐马的标配是短颈肥臀、四肢粗壮,这种以肥为美的取向可不是审美跑偏,而是实打实的基因优势。



唐·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阅读是我的爱好,大概9岁那年开始阅读。上世纪60年代,父亲第三次当选天津市劳动模范时,奖品是一套《毛泽东选集》,我如获至宝,那时识字量有限,直到上中学时才通读下来。1970年的一天,天津一中曹长裕、李宏俊两位老师突然来家访,我正读《毛泽东选集》,曹老师那句“这孩子爱学习”的夸奖至今难忘。工作后,我走上出版社编辑岗位,与阅读、文字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收藏着不少老报纸,有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月的《人民日报》,也有《天津日报》为主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国家大事的特刊,每一张旧报都是值得珍藏的历史见证。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我家的书报安置点不断升级:从最初东西挤挤巴巴的综合书柜,到扩充后的几个书柜,再到后来拥有一面书墙的房间。经历过几次搬家,那些沉甸甸的书报最令我珍惜,多数家庭搬家利落,我却要为书报的安置折腾数日,只因不忍抛弃大半生的心血。

我部分藏书的扉页上有着大家的签名,信手拈来一本书、一封信,哪怕是一个纸条、一张明信片,都能牵出一段难忘的过往,因此,让我给书房“断舍离”很难。藏书中,既有我自己编辑的书,也有珍藏多年的旧书,更难得的是五四名家的墨迹——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55位名人的墨宝,这是现代教育家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多年前在美国用高清设备复印后寄来的,恍如真迹。

二十多年来,我与诸多文坛前辈及其后人相交,协助他们列提纲、写作、编辑书籍,这份情谊早已化作沉甸甸的委托。几位著作权人的委托书,版权事宜全权托付于我。除了罗久芳、翻译家文洁若的部分著作,现代著名作家梁实秋之女梁文蔷的著作,也渐渐托付于我,她说:“你真是少有的编辑,不是编完一本书就了事,还当我们的账房先生,代收稿费并及时转给我或我的国内亲属,陪着我们继续走文化长征。”16年前,在我退休之际,梁文蔷写了五千字的文章《书缘》,记录我们的友谊,她认为我出版一部《编书记》一定好看。去年6月,我带着子孙参观青岛梁实秋纪念馆,发现馆内相关书籍甚少。回天津后,我从多家出版社购得梁家两代人的著作寄去,以丰富馆藏。年底,该馆馆长告诉我,这些捐赠的书籍引得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观团驻足翻阅,没想到这群学生中竟有在北大燕京学院读研究生的梁实秋的外孙女。这个女孩出生在美国,为传承外曾祖父梁实秋的文化基因,在祖母梁文蔷的影响下,大学本科时到台湾学习汉语,研究生阶段又来到北大读书。我把馆长传来的照片马上上传给位于西雅图的梁文蔷,她当即感叹道:“太神奇了,我还没收到孙女的消息和照片,你倒先看到了。”

我还存有许多珍贵的书信:现代女作家陈衡衡的女儿任以都教授从美国寄来的信;《联合国宪章》起草者之一浦薛凤先生的手迹;闻一多致梁实秋的信;沈从文后沈从文先生的亲笔信及素描画;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幼女丰一吟的几十封信;“珞珈三杰”之一袁昌英教授的女儿、著名翻译家杨静远的信;清华大学国学大师赵元任先生次女赵新那寄来的信;《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先生的亲笔信;百花文艺出版社创始人之一徐柏容先生的来信;等等。近年99岁的文洁若先生素来俭朴,她用珍藏的旧挂历纸抄录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赠予我;后来,她又在我的记录本上题下“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并盖上她和已故丈夫萧乾先生的两枚大印

作为纪念。老舍先生的女儿舒济女士为我写下一句话:“艳华,我最喜欢看你编的书了。”没有想到我编辑的书,还间接推动了几位现代名人纪念馆的落成,这着实出乎我的预料。

2006年至2007年,我协助罗久芳编写《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这本书生动记述了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的生平及其夫人张维桢的不凡人生。浙江徐永福先生竟据此书的线索找到了罗家伦的故居。此后,绍兴市柯桥区政府、钱清街道办事处及江墅村村委会,携手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建筑系和校友会,在保存罗家原有土屋的基础上建起“罗家伦生平陈列馆”,后又建立“罗家伦书院”。纪念馆收藏了众多文物,并陈列罗家伦家族年谱与事迹。两馆成为当地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落成纪念会上,罗家伦在国内的亲属和我受邀参与见证揭幕,并捐出部分与罗家相关的物品。一本书“催生”两座场馆,这是我不曾想到的。2023年4月,浙江话剧团将表现罗家伦生平的话剧《春光明媚的日子》之首演放在了清华大学。2026年开年,罗家伦家乡钱清街道和江墅村共同编写的《江墅村志》出版,江墅村党总支书记施生华签名寄给了我。

海外华人文艺团体“白马文艺社”元老浦丽琳(笔名文芷),不仅将浦家两代人的著作全权委托我联系出版事宜,并送我具有史料价值的其父浦荫凤著作《战时论评集》,并签名“送给世界上最好的编辑——艳华 丽琳敬赠”。我深知,世间好书的后面都有编辑在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编辑的努力充满神圣使命的幸福。退休后,我协助浦丽琳编辑《海外拾珠》一书,收录浦荫凤与清华师生的往来书信。该书于2012年出版后,引起浦先生的母校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范宝龙以及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的关注,他们两次赴常熟热推了当地浦荫凤文物展示馆的建立。2025年初,洛杉矶遭遇百年不遇的大火,93岁的浦丽琳心焦而又无奈地看到家中收藏的珍贵文物、名画、书籍,尽毁于一旦。大火燃烧的近一个月里,我寝食难安,在焦灼中写下八千余字的文章《守望情牵——洛杉矶火灾中的浦荫凤后代》,见报后引发关注。抗战前与浦丽琳姐妹同在清华幼儿园上学的宋以敏女士看到文章后,寄来几幅当年的珍贵合影,我迅速转发给浦丽琳,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是一个温暖的慰藉。最近,天津教育出版社重新编辑修订《浦荫凤师友书简》一书,即将出版精选本,弥补了我过去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遗憾。

多年的编辑生涯,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文化大家,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向上向前的力量。表演艺术家、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2005年重版《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时,在题为《写给天上的二哥》的序言中写道:“昨天百花出版社阿艳打长途来,向我讨《两地书》。我说在应红处。她说我找李辉要……”黄老口中的“阿艳”就是我,尽管我们没有合作成功,可黄老去世后,我从一篇散文里知道老人在上海华东医院病榻上曾认真阅读了我编辑的书,还在日记中作了中肯的评价。想到这些心绪难安。黄老晚年“一息尚存,不落征帆,不以不知为耻,仅以不学为憾”的自勉之句,也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至今仍像在职时一样读着、编着、写着文字,年逾古稀,写作与思维仍得心应手、与时俱进,应得益于多年的博览群书。 图摄影:刘明辉



## 书信缘

高艳华



作为纪念。老舍先生的女儿舒济女士为我写下一句话:“艳华,我最喜欢看你编的书了。”

没有想到我编辑的书,还间接推动了几位现代名人纪念馆的落成,这着实出乎我的预料。

2006年至2007年,我协助罗久芳编写《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这本书生动记述了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的生平及其夫人张维桢的不凡人生。浙江徐永福先生竟据此书的线索找到了罗家伦的故居。此后,绍兴市柯桥区政府、钱清街道办事处及江墅村村委会,携手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建筑系和校友会,在保存罗家原有土屋的基础上建起“罗家伦生平陈列馆”,后又建立“罗家伦书院”。纪念馆收藏了众多文物,并陈列罗家伦家族年谱与事迹。两馆成为当地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落成纪念会上,罗家伦在国内的亲属和我受邀参与见证揭幕,并捐出部分与罗家相关的物品。一本书“催生”两座场馆,这是我不曾想到的。2023年4月,浙江话剧团将表现罗家伦生平的话剧《春光明媚的日子》之首演放在了清华大学。2026年开年,罗家伦家乡钱清街道和江墅村共同编写的《江墅村志》出版,江墅村党总支书记施生华签名寄给了我。

海外华人文艺团体“白马文艺社”元老浦丽琳(笔名文芷),不仅将浦家两代人的著作全权委托我联系出版事宜,并送我具有史料价值的其父浦荫凤著作《战时论评集》,并签名“送给世界上最好的编辑——艳华 丽琳敬赠”。我深知,世间好书的后面都有编辑在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编辑的努力充满神圣使命的幸福。退休后,我协助浦丽琳编辑《海外拾珠》一书,收录浦荫凤与清华师生的往来书信。该书于2012年出版后,引起浦先生的母校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范宝龙以及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的关注,他们两次赴常熟热推了当地浦荫凤文物展示馆的建立。2025年初,洛杉矶遭遇百年不遇的大火,93岁的浦丽琳心焦而又无奈地看到家中收藏的珍贵文物、名画、书籍,尽毁于一旦。大火燃烧的近一个月里,我寝食难安,在焦灼中写下八千余字的文章《守望情牵——洛杉矶火灾中的浦荫凤后代》,见报后引发关注。抗战前与浦丽琳姐妹同在清华幼儿园上学的宋以敏女士看到文章后,寄来几幅当年的珍贵合影,我迅速转发给浦丽琳,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是一个温暖的慰藉。最近,天津教育出版社重新编辑修订《浦荫凤师友书简》一书,即将出版精选本,弥补了我过去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遗憾。

多年的编辑生涯,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文化大家,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向上向前的力量。表演艺术家、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2005年重版《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时,在题为《写给天上的二哥》的序言中写道:“昨天百花出版社阿艳打长途来,向我讨《两地书》。我说在应红处。她说我找李辉要……”黄老口中的“阿艳”就是我,尽管我们没有合作成功,可黄老去世后,我从一篇散文里知道老人在上海华东医院病榻上曾认真阅读了我编辑的书,还在日记中作了中肯的评价。想到这些心绪难安。黄老晚年“一息尚存,不落征帆,不以不知为耻,仅以不学为憾”的自勉之句,也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至今仍像在职时一样读着、编着、写着文字,年逾古稀,写作与思维仍得心应手、与时俱进,应得益于多年的博览群书。 图摄影:刘明辉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至今仍像在职时一样读着、编着、写着文字,年逾古稀,写作与思维仍得心应手、与时俱进,应得益于多年的博览群书。 图摄影:刘明辉

唐代和西域交流频繁,大宛汗血马、波斯马、突厥马等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和中原马种杂交后,养出了一批又高又壮的“混血马”——肩高可达1.5米,比汉代普通马高出约10厘米,跑起来又稳又快,拉车、打仗、出游都好用。《唐六典》里记载,唐代的马分为细(良)马、中马、弩马三个等级,良马的标准是骨格高大,肌肉丰满。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马痴”,他有六匹心爱的战马,下令让工匠把它们刻成浮雕,立在自己的陵墓昭陵北司马道两侧,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骏”。他还写过《咏饮马》诗:“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纆。细纹连喷聚,乱绕绕蹄繁。”字里行间都是对马的喜爱。

唐代的马不仅体型好,待遇也高:宫廷里有专门的马医,马厩冬天要垫干草,夏天要通风降温,连马的饲料都有严格标准,分为草料、精料,精料里还有豆类、谷物。这种对马的重视,也让唐马的形象充满了自信与豪迈,就像盛唐的气象一样,自带气场。

昭陵六骏就是盛唐马的“形象代言团”,每一匹都有战功在身。“飒露紫”是李世民平定东都时的坐骑,身上中了一箭,仍然昂首冲锋,旁边的丘行恭正在为他拔箭,浮雕把马的忍痛与忠诚刻得入木三分;“拳毛騧”在李世民与刘黑闥作战时,身中九箭依然飞驰,帮主人杀出重围;“白蹄乌”则载着李世民一天一夜跑了两百里,最终平定薛仁果。这些浮雕没有华丽的纹饰,只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马的身形,却把马的勇猛和灵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天津博物馆藏天马驸(蹄)铜镜,更是把唐代的浪漫与豪迈“焊”在了一起:直径8.6厘米,以一只驯马的天马为镜钮,天马两肋生翼,身上的鬃毛用阴刻线细细刻画,仿佛风吹过就会飘动。镜背的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是天马踏波,外区是缠枝莲纹,旁边还有“天马驸”三个字的铭文。“天马”的说法来自西域,《史记·大宛列传》里说“天子得乌孙马,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唐人把这种西域神话里的形象,和中原的铜镜工艺结合起来,既展现了对异域文化的包容,也彰显了“踏遍四方”的豪情。

前几年,这面镜子在法国巴黎展出时,不少外国观众都被它的精美工艺和历史内蕴所震撼,纷纷拍照留念——毕竟,这种融合了力量与浪漫的艺术,不分国界。

# 满庭芳

第五四八期